

中华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本土化

以朝鲜半岛、日本、越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

摘要： 中华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本土化，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具持续性和影响力的文化交流现象之一。本文以朝鲜半岛、日本、越南为中心，系统考察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路径、本土化机制与文化影响。研究表明，中华文化的传播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，而是一个中心—边缘互动、接受—变异交织的复杂过程。东亚各国在吸收汉字、儒学、佛教、律令制度等中华文化要素的同时，根据本土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形态。这种和而不同的东亚文化格局，为理解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。

关键词： 中华文化；东亚；汉字文化圈；儒学传播；本土化；文明互鉴

目录

- 一、引言：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意义
- 二、传播的基础与路径
- 三、朝鲜半岛：儒学的深度本土化
- 四、日本：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
- 五、越南：东南亚的儒学国家
- 六、本土化机制的理论反思
- 七、当代启示与未来展望
- 八、结语
 - （一）汉字：文化传播的载体
 - （二）儒学：思想体系的传播
 - （三）佛教与律令制度
 - （一）从事大到小中华

- (二) 性理学的朝鲜化
- (三) 韩文创制与文化自觉
- (一) 遣唐使与文化移植
- (二) 儒学的日本化
- (三) 和魂汉才与文化融合
- (一) 北属时期与文化奠基
- (二) 独立后的文化延续
- (三) 喃字与本土文学
- (一) 中心—边缘的互动模式
- (二) 接受—变异的辩证关系
- (三) 文化认同的多重性
- (一) 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
- (二) 东亚文化共同体的重建
- (三) 文明互鉴的东方智慧

一、引言：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意义

东亚文化圈，又称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，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持续性和内在凝聚力的文化区域之一。这一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，涵盖朝鲜半岛、日本、越南等地区，以汉字、儒学、汉传佛教、律令制度为共同文化要素，形成了一个跨越政治边界的文化共同体。

与西方文化的殖民扩张模式不同，中华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主要通过和平的文化交流、贸易往来、使节互访和移民等方式实现。东亚各国并非被动接受中华文化，而是根据自身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，进行了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。这种传播模式，为理解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提供了独特的历史经验。

本文旨在系统考察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、日本、越南的传播历程与本土化机制，探讨这一历史过程对当代东亚文化关系的启示。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今天，重新审视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。

二、传播的基础与路径

（一）汉字：文化传播的载体

汉字是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的首要载体。作为一种表意文字系统，汉字具有超越语音差异的文化整合能力——不同语言的民族可以通过汉字进行书面交流，共享同一套文化经典。这一特性使汉字成为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石。

汉字的东传始于秦汉时期。公元前2世纪，汉字随汉朝的政治影响力传入朝鲜半岛；公元3世纪左右，汉字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；公元前1世纪，汉字随汉朝的郡县制度传入越南。在随后的千余年中，汉字成为东亚各国的官方文字和学术语言，《论语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等儒家经典通过汉字在东亚广泛传播，构成了各国知识阶层的共同文化底色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汉字在传播过程中也经历了本土化改造。日本发展出假名文字系统（平假名和片假名），将汉字与本土语音结合；朝鲜王朝世宗大王于1443年创制训民正音（韩文），但汉字仍长期作为官方文字使用；越南则在汉字基础上发展出喃字，用于记录本土语言。这些文字创新，体现了东亚各国在接受汉字的同时，对本土文化主体性的坚持。

（二）儒学：思想体系的传播

儒学是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的核心思想内容。儒学的政治理念、伦理规范、教育制度和社会理想，为东亚各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方案。

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，经历了从三国时期的初步接受，到高丽王朝的发展，再到朝鲜王朝的独尊儒术。朝鲜王朝（1392-1910）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，建立了完备的科举制度和书院教育体系，涌现出李退溪、李栗谷等儒学大师，将朝鲜儒学发展到了极高的理论水平。

儒学传入日本后，与本土的神道教和武士道文化相结合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儒学。江户时代（1603-1868），朱子学被德川幕府确立为官方学术，藤原惺窝、林罗山等儒学家推动了儒学的日本化。日本儒学更强调忠的伦理，与中国儒学更重仁的特点形成差异，体现了儒学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适应性变化。

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同样深远。自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交趾三郡起，儒学在越南逐步传播。李朝（1010-1225）建立文庙、实行科举，陈朝（1225-1400）和后黎朝（1428-1789）进一步推崇儒学，使越南成为东南亚重要的儒学国家。越南儒学在发展过程中，与本土的村社制度和祖先崇拜相结合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。

（三）佛教与律令制度

除汉字和儒学外，汉传佛教和律令制度也是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的重要内容。佛教经中国传入东亚各国后，与中国化的佛教宗派（如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）一起，深刻影响了各国的宗教文化。日本的鉴真东渡、朝鲜半岛的义湘入唐求法，都是佛教文化交流的著名事例。

律令制度则是中华文化在政治制度层面的输出。日本的大化改新（645年）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；朝鲜半岛的新罗和高丽王朝也效仿唐朝制度，建立了相应的官僚体系和法律制度；越南的李朝、陈朝同样采用中国式的律令制度。这些制度移植，使东亚各国在政治结构上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。

三、朝鲜半岛：儒学的深度本土化

（一）从事大到小中华

朝鲜半岛是接受中华文化最为深入的地区之一。历史上，朝鲜王朝长期奉行事大主义外交政策，以明朝为宗主国，在文化上以小中华自居。这种文化认同在明朝灭亡后达到顶峰——朝鲜王朝认为满清入主中原是华夷变态，而自己才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。

这种小中华意识体现了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，但同时也包含着文化主体性的建构。朝鲜并非简单复制中国文化，而是在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创新。例如，朝

鲜的两班贵族制度虽效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，但具有更强的世袭性和封闭性；朝鲜的书院制度虽源于中国，但发展出了独特的讲学传统和地方势力。

（二）性理学的朝鲜化

朝鲜儒学最杰出的成就是性理学（程朱理学）的高度发展。李退溪（1501-1570）创立的退溪学和李栗谷（1536-1584）创立的栗谷学，将程朱理学发展到了新的理论高度。退溪的四端七情之辩，栗谷的理通气局之说，都是对理学核心问题的创造性回应，在东亚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朝鲜性理学的发展，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深化，更是社会实践层面的落实。朝鲜儒者通过书院教育、乡约制度、礼制改革等方式，将儒学伦理渗透到基层社会，深刻塑造了朝鲜民族的文化性格。这种理论—实践的双向互动，使儒学在朝鲜半岛获得了深厚的社会根基。

（三）韩文创制与文化自觉

1443年，朝鲜世宗大王创制训民正音（韩文），这是东亚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。韩文的创制，表面上是文字改革，实质上是文化主体性的觉醒。世宗大王在《训民正音》序文中说：国之语音，异乎中国，与文字不相流通。这表明，朝鲜已经意识到本土语言与汉字之间的张力，开始寻求文化表达的自主性。

然而，韩文的推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在创制后的数百年间，汉字仍是官方和知识阶层的正式文字，韩文主要用于女性和平民阶层。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，韩文才逐步取代汉字成为正式文字。这一过程，折射出朝鲜半岛在中华文化影响下寻求文化自主的复杂历程。

四、日本：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

（一）遣唐使与文化移植

日本是中华文化传播中最具选择性吸收特征的国家。公元7至9世纪，日本派遣大量遣隋使、遣唐使入华，系统性地学习中国的制度、文化和技术。但日本的学习并非全盘照搬，而是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和改造。

最典型的例子是科举制度。日本虽然学习了唐朝的律令制度，却没有引入科举制度。这是因为日本的社会结构以世袭贵族为基础，科举制所代表的选贤任能原则与世袭体制存在根本冲突。日本选择了保留贵族制度，同时吸收中国的官僚行政技术，形成了摄关政治、院政等独特的政治形态。

（二）儒学的日本化

日本儒学的发展，体现了鲜明的本土化特征。与中国儒学以仁为核心不同，日本儒学更强调忠的伦理。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山鹿素行将儒学与武士道结合，提出了士道理论，强调武士对主君的绝对忠诚。这种忠优先于仁的伦理取向，是日本社会结构（幕藩体制、武士阶层）在儒学中的折射。

此外，日本儒学还发展出了独特的古学和国学传统。古学派（如山鹿素行、伊藤仁斋、荻生徂徕）试图回归孔孟原始儒学，批判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；国学派（如本居宣长）则进一步主张回归日本本土的神道传统，排斥儒学的影响。这些思想运动，反映了日本在吸收儒学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与主体性建构。

（三）和魂汉才与文化融合

和魂汉才是日本文化吸收模式的经典概括。它意味着以日本本土精神（和魂）为根本，以中国文化知识（汉才）为工具。这种模式使日本在吸收中华文化的同时，始终保持着本土文化的主体性。

这种融合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：文字上，汉字与假名并用；宗教上，神道教与佛教共存（神佛习合）；饮食上，中国传入的面条、豆腐、茶叶被改造为日式拉面、汤豆

腐、抹茶；建筑上，中国的寺院建筑被改造为日本的枯山水庭院。日本文化的这种混血特征，正是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的结果。

五、越南：东南亚的儒学国家

（一）北属时期与文化奠基

越南是东亚文化圈中地理位置最南的国家，也是唯一经历了长达千年北属时期（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，越南为中国郡县）的国家。这一特殊历史使越南接受中华文化的程度极为深入。

在北属时期，中原的政治制度、生产技术、汉字儒学、佛教道教等文化要素系统传入越南。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三郡的设立，使越南成为汉朝疆域的一部分，也使中华文化在越南获得了制度化的传播渠道。东汉时期，锡光、任延等地方官员在越南建立学校，导之礼义，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早期传播。

（二）独立后的文化延续

939年吴权独立后，越南并未脱离中华文化的影响，反而在自主国家的框架下继续发展儒学文化。李朝（1010-1225）建立文庙、实行科举；陈朝（1225-1400）推崇儒学，编撰史书；后黎朝（1428-1789）以儒学为治国之本，黎太祖颁布《平吴大诰》，以儒家仁义思想论证独立的合法性。

越南儒学的发展，与本土的村社制度和祖先崇拜深度融合。越南的村社具有很强的自治传统，儒学的乡约、礼制被改造为村社的行为规范；祖先崇拜则与儒学的孝道相结合，形成了越南独特的家族文化。这种融合，使儒学在越南获得了深厚的民间基础。

（三）喃字与本土文学

越南在汉字基础上发展出喃字，用于记录越南语。喃字的创制，使越南得以用本土语言进行文学创作，产生了《金云翘传》《宫怨吟曲》等经典文学作品。阮攸的《金云翘传》以喃字写成，取材于中国小说《金云翘传》，但融入了越南的社会现实和情感体验，成为越南文学的巅峰之作。

喃字文学的兴起，标志着越南文化主体性的觉醒。但与韩文不同，喃字始终未能完全取代汉字，汉字在越南一直使用到20世纪初法国殖民统治时期。1918年，法国殖民当局废除汉字和喃字，推行拉丁化的国语字，这才终结了汉字在越南的官方地位。

六、本土化机制的理论反思

（一）中心—边缘的互动模式

中华文化在东亚的传播，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心输出、边缘接受的单向过程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中心与边缘持续互动的动态过程。中国作为文化中心，提供了汉字、儒学、制度等核心文化要素；而东亚各国作为边缘，并非被动接受，而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、改造和再创造。

更重要的是，边缘的文化创新有时会反过来影响中心。例如，日本保存了大量在中国已失传的唐代典籍和文物，朝鲜的性理学发展对中国儒学也有一定的反馈影响。这种中心—边缘的互动，使东亚文化圈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态系统。

（二）接受—变异的辩证关系

文化传播的过程，同时也是文化变异的过程。任何文化要素在跨文化传播中，都必然经历再语境化——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新的意义。儒学在朝鲜强调礼的制度化，在日本强调忠的伦理化，在越南强调孝的民间化，这些变异并非对原典的偏离，而是儒学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合理发展。

这种接受—变异的辩证关系，提醒我们在研究文化传播时，不能以纯粹性为标准评判本土化的结果，而应当关注文化要素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性和创造性。东亚各国的儒学发展，恰恰证明了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和生命力。

（三）文化认同的多重性

东亚各国在吸收中华文化的过程中，始终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多重性问题。一方面，通过汉字和儒学，各国知识阶层共享着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；另一方面，通过本土语

言、本土宗教、本土历史，各国又保持着独特的民族文化认同。这两种认同并非非此即彼，而是在不同层面上共存。

这种多重文化认同，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经历了剧烈的调整。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，各国纷纷强调本土文化的独特性，弱化与中华文化的关联。但历史形成的文化联系是无法割断的，汉字、儒学、佛教等文化要素依然深刻存在于各国的文化底层。理解这种多重性，是理解当代东亚文化关系的关键。

七、当代启示与未来展望

（一）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

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与本土化的历史经验，对当代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启示。首先，文化传播的最佳方式不是强制输出，而是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资源，让接受方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吸收。其次，本土化不是文化的失真，而是文化在新环境中的再生，应当尊重和鼓励本土化的创造性转化。再次，文化交流应当是双向的、平等的，中心与边缘的划分是历史的、动态的，不应成为文化等级的依据。

（二）东亚文化共同体的重建

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今天，重建东亚文化共同体成为一个重要议题。历史上的东亚文化圈以汉字、儒学、佛教为共同基础，而当代东亚则面临着政治分歧、历史记忆、经济竞争等多重挑战。但历史形成的文化联系依然存在，汉字文化、儒学传统、佛教文化仍是东亚各国共享的文化资源。

重建东亚文化共同体，不是要回到历史上的朝贡体系，而是要在平等、互利、互鉴的基础上，发掘共同的文化遗产，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。儒学中的和而不同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，可以为东亚区域合作提供文化资源；汉字、书法、茶道、武术等文化形式，可以成为民间交流的桥梁。

（三）文明互鉴的东方智慧

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与本土化的历史，为世界文明互鉴提供了东方智慧。与西方殖民扩张模式下的文化同质化不同，东亚的文化交流模式是和而不同——在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同时，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。这种模式证明，文化交流不必以牺牲文化多样性为代价，不同文明可以在交流中相互学习、共同发展。

在文明冲突论依然有市场的今天，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具有特殊的价值。它表明，不同文明之间可以通过和平的文化交流，形成深度的文化联系，而不必诉诸武力和征服。这种以文化人的东方智慧，或许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的借鉴。

八、结语

中华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本土化，是世界文明史上持续时间最长、影响最深远文化交流过程之一。从汉字的传播到儒学的本土化，从律令制度的移植到佛教的地方化，东亚各国在吸收中华文化的同时，始终保持着文化主体性和创造性。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，而是中心与边缘互动、接受与变异交织的复杂历史。

今天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，看到的不仅是过去的文化辉煌，更是未来文明互鉴的可能性。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：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，交流的真谛在于互鉴，互鉴的前提在于尊重。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，这份来自东亚的历史智慧，值得全世界认真对待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周一良. 中外文化交流史[M]. 郑州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1987.
- [2] 朱云影. 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[M].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7.
- [3] 韩振乾. 韩国朝鲜文化研究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1.
- [4] 王家骅.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[M].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1990.
- [5] 于向东. 越南文化研究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7.
- [6] 葛兆光. 宅兹中国——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1.

-
- [7] 滨下武志.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——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[M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9.
- [8] 李退溪. 退溪全书[M]. 首尔: 成均馆大学, 1958.
- [9] 阮攸. 金云翘传[M]. 河内: 越南文学出版社, 1959.
- [10] 山室信一. 思想课题作为亚洲的思考[M]. 东京: 岩波书店, 2001.